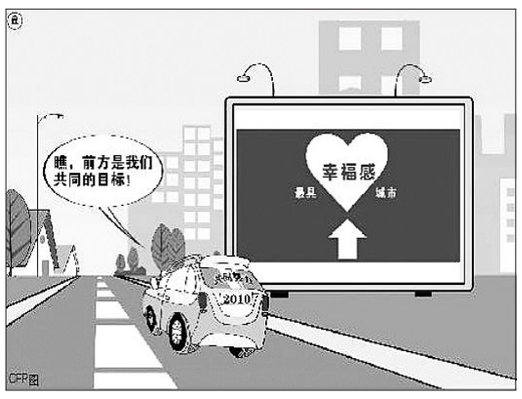
哪个省的GDP含金量更高?

2010年中国GDP毫无悬念地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日本经济财政大臣回应称:“日本将不会与中国竞争GDP排名,我们搞经济不是为了争排名,而是为了使日本国民过上幸福的生活。”毫无疑问,在下一个五年,中国衡量发展成果的指标也应顺时而变。



GDP高速

最近10年,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大跨步前进。

2005年年底,中国GDP增加16.8%,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06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07年,中国GDP增速为13%,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仅仅3年之后,中国GDP便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

中国的GDP从1978年的2683亿美元,猛增到2010年的5.879万亿美元,30余年间增长了20余倍,平均增速接近10%。从多省区市的情况看,GDP超万亿(人民币)的省份迅速增加,有些省份“富可敌国”,甚至赶超当年的“亚洲四小龙”。

在2009年14个省(市、区)GDP总量超万亿元后,2010年“万亿俱乐部”新增加3名成员,达到17个。其中,东部的广东、山东已经超过4万亿,中西部地区增长也十分强劲:内蒙古、黑龙江和陕西迈入“万亿俱乐部”,辽宁和四川超过上海跃居第七位和第八位。在全国各地正在制定和实施的“十二五”规划中,尽管淡化了GDP指标,但多个省市仍然抛出了雄心勃勃的GDP增长计划。

“失衡”的增长

目前,我国经济总量、财政收入位居世界前列,但居民收入水平及增长速度却不能与之匹配。公开数据显示,1978~2007年间,我国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从15.65%下降到11.15%;全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62.34%下降到42.60%。

与此同时,1978~2007年间的GDP年均增长速度是9.8%,居民收入年均增长速度是7%,居民消费支出年均增长8.8%。正是由于这个比重的不断下降,才导致了我国经济的失衡状态,即当下的GDP比重中,国内居民消费不到35%,而投资与净出口却占了65%,由此形成了典型的投资扩张而内需不足的经济模式。

相应的,我国各级部门行政开支比例却不断上升。当前我国行政费用开支占财政收入的26%,而日本只占3%,欧洲许多国家也不到4%。近20年来,我国每年的GDP增长率不到10%,而税收和行政费用的开支增长速度都在20%~30%。数据显示,在“十一五”期间,我国GDP增速超过10%,而财政收入年均在20%左右,远远高于同期居民收入增速。

全国人大代表程恩富认为,衡量经济发展程度与经济实力,不只是看GDP指标,首先应看民众收入多少,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高低,以及“幸福感”的高低,这体现了GDP的含金量。否则,单纯的GDP增长是毫无意义的,此种GDP对公众来说没有多少吸引力。

中国需要“人性化的GDP”

2010年9月1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到了“包容性增长”这个词,这被认为是中国领导人在“调整、酝酿新的发展战略”的重要信号。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包容性增长”的核心内容包括公平正义体现核心价值、调节个税缩小贫富差距、形成成熟的公共生活领域,实现“共同治理”、扩大内需重在引导居民消费等几大方面。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五大目标,其中居民收入较快增加是一个重要的目标。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在一次谈话中表示,“十二五”规划与此前的规划有着本质的差别,过去的规划追求“国强”,“十二五”规划则追求“民富”。“十二五”规划政策的着力点应该转到把提高居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富裕人民群众作为全新思路和战略。

而正如学者所言,从“藏富于国”到“还利于民”目标的提出,意味着国家将完善收入分配格局提升到更重要的战略高度。因而,有评论认为,“重视GDP的增速的同时,不忘提高居民收入、提升民众‘幸福感’,只有这样‘人性化的GDP’,才会被最广泛的民众所接受。”

GDP含金量:上海 北京 安徽位列前三

怎样才能计算出GDP的含金量,体现“人性化的GDP”呢?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杨开忠提供了对应的计算公式:先计算出“人均GDP”,即用“当地GDP”除以“常住人口”;然后用“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以“人均GDP”,得出的“单位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相当于人均GDP的含金量。

在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中,并没有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相关指标。这些指标又将如何计算出呢?统计学专家表示,人均可支配收入可以是近似值,具体的计算方法是:(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人均可支配收入近似值。

根据杨开忠提供的计算公式,从全国各省、区、市公布的最新数据,计算得出了全国各省区市的单位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即GDP“含金量”,绘制出了“2010年全国各省、区、市GDP含金量排名”:

上海、北京、安徽、贵州、广西、海南、江西、云南、重庆、浙江、广东、黑龙江、福建、四川、湖南、天津、吉林、湖北、山西、宁夏、辽宁、甘肃、江苏、河南、河北、陕西、山东、青海、新疆、西藏、内蒙古。

在这里,人均GDP是分母,人均可支配收入近似值是分子,也就是说,人均GDP高的反而不一定好,还取决于人均可支配收入近似值的高低。

数据还显示:GDP高的省份,GDP含金量排名并不靠前,很多还很靠后。2010年,GDP总量前5名的省份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其对应GDP含金量排名则为:第11位、第23位、第27位、第10位、第24位。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贵州的GDP总量排第26位,其GDP含金量却为第4位。

与去年各省GDP含金量相比较,排名前两位的上海、北京没有变化,而西部地区提升较为明显,次位提升最大的是贵州、广西,由2009年的第11、12位升至2010年的第4位和第5位;此外,天津、四川、河南名次也有明显提升;而黑龙江、浙江、海南等出现名次下滑。 据《中国经济周刊》

一个偏远乡镇的村支书效应

本报记者 谢庆

随着时代的变迁,村支书的角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曾经在“火红的年代”甚至可以决定村民命运的领导,逐渐失去了原有的类似于家长的权利,褪去了曾经的光环,却要承担更大的责任。这一大一小的反差,使得越来越多的村支书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不少人有了“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的抱怨,甚至有人发出了“做得好县长,不一定做得好村支书”的感叹。

作为新中国最小的官,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变迁后,如何重新找准自己的定位,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为群众服好务?记者在荥阳市汜水镇采访时,感受到了这种转变之后的欣慰。在这里,村支书们不但成了群众离不开的万事通和勤务兵,更成为党在基层坚实的堡垒。

支书的职责:当好勤务兵

在汜水镇赵村,村支书杨亦文正忙着通知村组干部和村民去地里浇麦子。每年农忙季节,也是他最忙的一段时间。

在这个村有个规矩,无论是浇地还是收麦子、种玉米,包括犁地耙地、秸秆还田,都是统一行动,有些类似于当年的大集体。浇地时,村干部把一切准备工作做好之后,根据每家田地的顺序通知农户,而农户只需要拿着铁锹到自家麦田看着就行了,其他工作村干部都已安排完了。同样,种麦之前,村里统一组织粉碎秸秆、统一犁地耙地、统一供应种子、统一播种,就连施肥都是统一的,麦收大忙季节,农户也只需要根据收割机来回的顺序,拿着口袋等着从收割机接下自家的麦子就行了,而且所有的费用都是由村里承担的。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到了农忙季节,外出打工的人甚至连家都不用回,庄稼就收好了。有的家里实在没人的,就得是村干部帮忙,直接把收好的粮食送到家里。”杨亦文这样告诉记者。

和赵村一样,汜水镇的所有村都用统一组织的方式进行着农业生产,只是有些集体经济稍弱、没有资金能力的村,电费、收割机费等还需要群众分担或部分分担。

“现在机械化程度这么高,村干部帮群众统一组织一下,比原来干活轻松太多了。有了统一的组织,效率提高很明显,不用群众各家各户再去找收割机、去找水管浇地了,咱实实在在地给群众当勤务兵,群众咋会再给咱脸子看呀!群众满意了,我的工作好干了,弄什么事都顺顺当当、高高兴兴的。”杨亦文喜滋滋地说道。

支书的感慨:不比县长好当

今年62岁的老君堂村支书武永和可算得上是个老支书了,到今年,他已经在村里当了18年支书。这几天,他正筹划着在村口树一个村标,这个标志是根据老君堂村的村名来历传说而专门请人设计制作的。

有人说他是个老油条,这话武永和并不回避。他这样解释自己这个老油条的概念,“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如今的村支书可不比原来了,手里没有一点权利,还得干好上级交办的任务,哪一项都是政治任务,必须完成,村支书既要不折不扣的执行上级党委决定,又要保护好群众的利益,还要直接面对每一个老百姓,处理每一件事,可老百姓并不是每件事都能理解或能马上理解,这时候凭啥?凭个人感情、凭个人威信,只能当‘油条’了。”武永和调侃地说道。

采访中武永和向记者说起了他经历的一件事。有一年麦收时,他在上街上班的哥哥因为要出差,就想让他先把家里的麦子收割了,好安心出差。“这在农村当支书是很犯忌的,那么多老百姓都看着呢,就因为你是支书的哥,支书就能把规矩坏了?”当时武永和硬是没有答应哥哥的这个要求,坚持按顺序收割村里的小麦,当年麦收进行得非常顺利。“毕竟还是一家人,我哥哥回来之后我赶紧去给他道歉,最后他还是理解我了。”

“面对千丝万缕的群众工作,耍点小聪明有时候还是很有必要的,你只要真正的凭良心去为他们着想,他们最终都能理解的,没有干不成的事,老百姓都是很善良的。”武永和这样说道。

支书的原则:公正赢得信任

农村工作千头万绪,各种关系非常复杂,而要想真正处理好这些纷繁的关系,只有把公开公正作为基本原则,才能在村支书的位置上站稳脚跟。

“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村支书说啥都是啥,甚至有时候还充当法官的角色,对那些不听话的,村支书都可以决定让他饿着肚子,现在完全不一样了,离开了村里的管理,人家在外照样活得很滋润,在村里,也不需要村支书给分配粮食了,村里对群众一丁点制约措施都没有,要想当好村支书,最根本的原则就是公正。只有公开公正,群众才会拥护你,你说啥群众才会服气。”口子村支书王拾金深有感慨地说道。

王拾金当支书已经17年了,口子村早已由一个乱村成为秩序稳定、管理民主、集体经济强的样板村,村里早已实现了自来水通、水泥路通、电话通、网络通等。上一届村委换届时,王拾金提出自己能不能不再兼任村主任了,这一次群众不听他的话了:“俺们这个村,拾金心地平和,处事公道,让他干我们放心。”原来这么多年来,口子村无论是搞公益事业,还是村民福利,大小事都开群众代表会、开党员会,公正处理事务,奠定了村支书在村里的威信。

支书的决心:一定要建新农村

这段时间,十里堡村支书柴天增、南屯村支书张根海的压力很大。周边的廖峪村、清净村、赵村新农村建设取得了成效,群众的生活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看到邻村的巨大变化,村里的老百姓开始给他们施加压力了:“人家的新农村都弄得那么好,咱们村为啥不搞呀?你要是搞不好就对不起父老乡亲了。”

众所周知,新农村建设是党和政府为改善农村群众生活条件而进行的一项惠民工程。根据各地情况不同,需要村里垫付大量的建设资金,经过验收合格后,上级会给予一定的补贴,可十里堡、南屯的经济情况并不很好。

带着群众的意愿,柴天增、张根海找到了该镇党委,可镇党委书记听完后除了高兴,还有些担心:你们村经济条件不算很好,能垫付那么多建设资金么?把今年的新农村试点放在你们村,你们搞不成怎么办。柴天增、张根海拍着胸脯保证:“如果把试点放在俺村,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新农村搞成,如果搞不成不光你不答应,老百姓唾沫星子都把我淹死了。”而此时,柴天增和张根海都已经大致测算出了凭自己村多年基础设施建设的积累,如果试点放在自己村,能做好这件事的把握已经超过了九成。

汜水镇的执政观:给百姓办实事

汜水镇位于荥阳西北部,是荥阳最偏远的乡镇之一,区位优势不明显,且地处丘陵地带,境内沟壑纵横,自然条件较差,但汜水镇综合经济位列全省二十强。一个没有任何区位优势的偏远乡镇,是如何凝聚人心,培养出这么多忠心于党的事业,自觉服务群众的基层干部的?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汜水镇党委书记陈耀宗。

采访中陈耀宗告诉记者这样一件事。以前这个镇真不愧汜水之称:由于汜水镇地势低洼,每到下大雨,洪水淹没农田、威胁村庄,由于排水设施不健全,乡村道路积水为患,破损严重,百姓出行不便,境内的一条汜河多年淤积,河道平铺,加剧了汛情,这就是当时的状况,也是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的热点难点问题。2005年镇党委决定实施沟河路渠综合治理,多方筹措资金,用蚂蚁啃骨头的办法,分三年实施了汜河清淤工程,达到了十年一遇的标准,从此,多年困扰该镇的“内涝水害”被彻底根除,新建的水利设施在这几年的汛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初步测算,仅秋粮不再淹这一项,每年就实现社会效益几百万元。这也是镇党委近几年给群众办的影响较大的一件实事。

在与支部书记的交谈中了解到,镇党委书记陈耀宗是2005年1月经汜水镇全体党员直接选举出的,是河南省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的四个试点之一,由于他是直选的书记,当时给全体党员有承诺,所以他在工作中把给老百姓办实事看得很重,盯得最死,要求得最严,管得最具体。

上任6年来,他坚持不懈地履行着当初的承诺:每年办一件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记者在该镇采访时,全国的冬小麦旱情仍在蔓延,谈到抗旱时,汜水的群众说,汜水麦田基本无旱情,因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田都是水浇地,人畜饮水没问题。记者再次感到十分诧异:像这种丘陵地带,像这样的地理地形条件,能有这样大比例的水浇地?直观上让人感觉到几乎是不可能的。记者实地采访后发现果然属实。陈耀宗告诉记者说:几年来他们坚持不懈地搞农业综合开发和小农水项目,现在基本都发挥作用了,临渴掘井怎么行,功夫都在平时啊!

收入分配公正重在顶层设计

收入对民众生活起着基础性作用。正因此,温家宝总理在与网友在线交流时明确表示:“今后五年,我们将把解决收入分配不公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并谈到了不少解决思路和办法。

更令人振奋的是,有关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理念、思路与办法,已进入操作层面。新华社2月27日的报道称,“有关部门将加快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努力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无疑,这样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让人期待。

应当看到,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办法举措非常之多,但大体都可以归为基础和非基础两个层面。基础层面,就是决定收入分配公正的基础性制度,具有本源性,处于分配的“顶层”。非基础层面,就是在基础层面基础上推出的一些具体制度、措施,基于同样的公正理由而调节收入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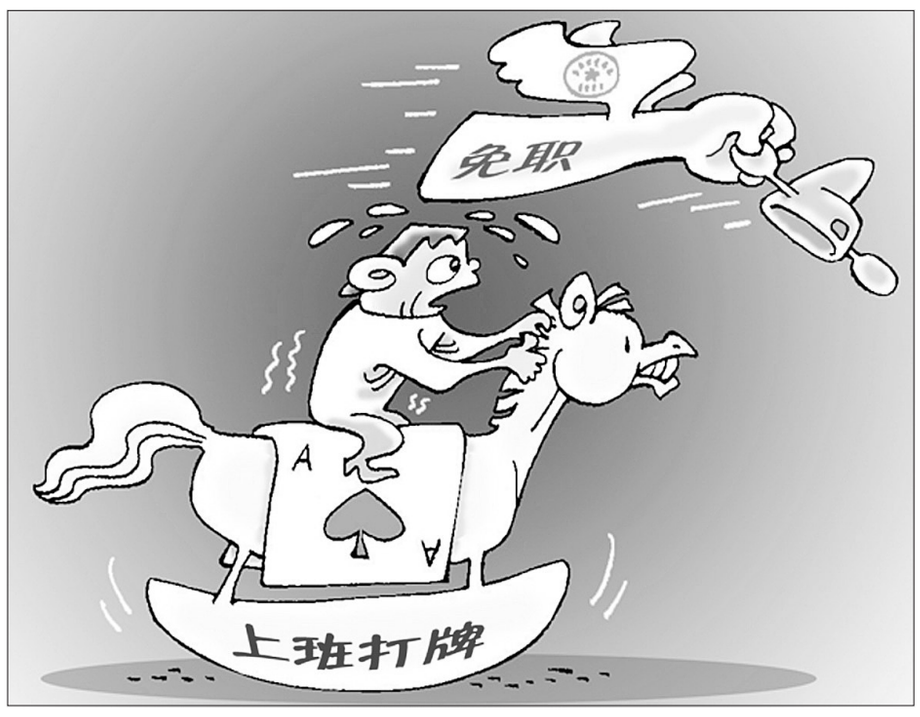
从分配效果上看,如果基础层面缺乏公正,由于当初制度设计的偏差,导致收入差距过大,那么,在非基础层面的许多办法就会部分失灵,甚至不起作用,或起相反作用。比如,一些行业收入差距过大,同行业内部不同层级收入差距大,都属于这种基础层面收入分配的制度性不公。面对这种差距,一些非基础层面的调节办法,往往不能触动高收入者分毫,却让一般收入者很受伤。因而,要确保收入分配公正,首先要注重在基础层面的改革,搞好这个“顶层设计”,才能从源头上保证收入分配的公正性,同时也保证非基础层面的调节手段起到显著作用。

事实上,无论是从总理的话语中,还是从此前有关政策的提示中,已经有一个较为明确的“顶层设计”思路。这就是,对收入进行“提低、扩中、限高”,大体合乎收入分配改革的科学方向。但现实地看,还需要对腐败性收入、灰色收入等进行制度性设障。如果这两方面成为不少人的收入来源,收入差距难免会继续拉大。

显然,这样的“顶层设计”,必须先有效破解两大难题。首先是如何科学兼顾公平与效率问题。这其实是个老问题,在这些年来的实践中,收入分配的天平逐渐在向公平这一边加重。之所以成为难题,就在于这个度不好把握,难以科学界定。比如,国内某一个行业,与其他行业相比,收入很高,但与国外行业相比,却不算高。把它的收入限制得太厉害,人才可能流失。公平与效率问题,说到底还是有没有充分市场化的问题。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决定收入分配方面,同样起着基础性作用。

另一个难题是,有没有勇气打破既得利益格局。收入分配改革,在相当程度上是一场利益调整,动人家的奶酪,人家会不高兴,但若不动,又会积重难返。这就需要妥协、平衡与协调,求取“最大公约数”,同时也更需要智慧。

“我们不仅要把蛋糕做大,而且要把蛋糕分好,要让每一个人都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本着这样的价值取向而孜孜以求,对于收入问题,民众也许就不再纠结。 吴乔



玩心太重也丢官

《扬子晚报》报道,南京市市长季建业曾在机关作风建设大会上怒批不少机关干部沉迷于扑克牌游戏,玩心太重,损害机关干部形象。南京市政府正式下发文件,重申严禁公务员在办公场所、工作时间参与打牌、下棋等游戏活动。南京栖霞区靖安街道国土管理所副所长侯广彪,竟顶风违纪,仍然在上班期间打扑克,南京市纪委、监察局已责成有关部门迅速对当事人作出免职处理。

“军中无戏言”,向来指军事队伍中纪律必须严明。其实政界也一样,若是颁布了一项办公规则,而所有的公仆皆置若罔闻,只当耳畔飘过一缕轻烟,那么,公务员的慵懒涣散就会必然无疑。因此,言必信,行必果,从来就是有志于干一番事业者的人生信条。这不,南京的许多机关干部们忽然时兴上班时间打扑克游戏来,一时间玩风盛行,大有横扫机关如卷席之势,惹得市长极为震怒,不但大会上猛批,更令政府下发文件禁止。没过多久,终于有一名公仆不以为然,一头撞上刚刚撒下的禁网,竟被立即摘掉了乌纱。

确实,假如隔三差五地不断下达禁令,却又无意当真实行,那么,久而久之,这令箭也不过与满天乱飞的鸡毛差不多,一定是无人理会。只有当人们看到这箭一发而中靶,决非无的放矢、无病呻吟之举,这才会刮目相看而不敢小觑。譬如这回,南京市实实在在地体现了纪律的严肃性。相信这样的实例来它一串,再贪玩的混世公仆也不会无动于衷。如此顶真,才足以一扫机关盛行的玩风,而促使官员们上班时将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去。 吴之如 文/画

让民众设计幸福指数来考核官员

从2008年起,河南省平顶山市把百姓“幸福指数”纳入官员政绩考核,5名干部因为考核不达标而暂缓提拔,所辖一县两区领导班子考核降级。

近年来,除了平顶山之外,也有一些地方将“幸福指数”纳入官员政绩考核。效果如何,其他地方还不太清楚,至少在平顶山,百姓“幸福指数”已经发挥了威力——这些做法加重了民生在政绩考核中的分量,促使官员把民生放在突出位置,值得鼓励。

不过,也要看到,现在这些将“幸福指数”当成政绩考核指标的地方,均面临“幸福指数”谁来制定、考核什么、能否真实地反映民众的幸福水平等关键问题。

从平顶山“幸福指数”的指标来看,整个体系共分为收入水平、消费结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生存状况和节能减排(生活环境)及可持续发展共5大类16个小项。16项具体指标中,“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科教文卫体事业支出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比重”权重最大,占比8%;“人均使用住房面积”、“公众安全感”等占权重最小,均为5%。

很显然,平顶山的“幸福指数”侧重的主要是一些物质性的可以量化的指标。如果要考核官员的话,这些物质性数据很重要,而且收入的确对底层民众的幸福感影响很大。但是,我们不能只看数字,尤其是“人均”数字,因为,这样的统计口径无法反映社会资源分配是否公平。社会富有不等于人人幸福,在一个社会公平、正义缺乏的地方,即便很富有,幸福感也会大打折扣。

2月27日,温家宝总理在回答网友有关“幸福”的问题时说:“对于幸福的理解和标准可能人们都有不同……我只是说如何让人们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对未来有信心。”

“四心”——总理的回答重申了这样的常识:幸福也是一种主观体验,幸福不幸福关键还是民众说了算。

因此,幸福指数的设计,固然需要客观的指标,但是,更重要的是,民众的感受与意见在其中必不可缺,而且要有相当大的分量。如果一些地方政府的“幸福指数”,考核权不在当地民众的手中,指数设计对民众的感受体现不足,那么,这样的“幸福指数”就很难真实反映民众真实的幸福感,地方官员的政绩也和当地民众的幸福感难以直接相关。

幸福指数是“福利经济学”的舶来品,其一般用来测量民众对幸福的主观感知。近年来,我国有些政府部门也试图引入幸福指数,这些动机值得肯定。不过,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对民众来说,公平缺失对幸福感的剥夺,要远远高于当下“效率优先”所带来的满足感,“幸福指数”倘若只是被用来考核政府官员的效率问题,或许真的跟提升民众的幸福感不太对路。

幸福在哪里?我们相信幸福或许就在温总理说的“让人们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有信心”的地方。一个能让人如此生活的地方,不仅仅是物质富裕,同时公平与正义也应该如大河之水那么丰沛。当下国民幸福感的提升,或许不是依靠一些地方官员对“幸福政绩”的膜拜,而是在于社会制度的维护与完善。 京文